

“四个全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根据时代变化与实践需要，大力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对中国战略布局进行新谋划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着眼新的实践，以新的理论概括，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内涵。

一、“四个全面”聚焦“中国梦”这个大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新路径

理论的生命力体现在对问题的解释、解答和解决的能力上。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开拓前进。我们认为，“四个全面”在“我们前所未有的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的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问题，为实现中国梦这一奋斗目标指明了路线图。总的来说，“四个全面”针对的是发展路径，谋划的是顶层设计，注重的是把握规律，是对当前社会发展种种问题明辨轻重缓急之后的明智抉择，有利于我们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具有思想引领、重点突破和战略提升作用。具体来看，每一个“全面”都与中国梦息息相关、密切相通。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里程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3个梯次递进的目标，共同形成了中国梦的基本构架。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二，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新引擎”。发展是最大的民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硬任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必将成为撬动中国梦的有力杠杆。第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稳定器”。法治既是重要的硬约束，也是关键的软实力。法治中国既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又是中国梦的可靠保障。第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只有全面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才能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打造成忠诚党的事业、勇于改革创新、深受群众拥护的“梦之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可见，“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途径，为推动中国梦的顺利起航树立了明确的前进航标。

二、“四个全面”对接“总布局”这个大蓝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确立了新指南

每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总以一定现实基础为条件；反过来，科学理论一旦形成，对现实基础有超越、引领和指导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久而弥新的真谛所在。“四个全面”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着眼深层思考和顶层谋划，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总布局确立了发展目标，用全面深化改革为总布局带来了内在动力，用全面依法治国为总布局提供了有效保障，用全面从严治党为总布局形成了强大支撑，对促进总布局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三、“四个全面”植根“新常态”这个大背景，为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新方

任何一种理论的诞生都离不开时代土壤的孕育。只有从时代沃土汲取丰富养料，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才会开得更加灿烂。“四个全面”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回答了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破解新常态下的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引领。全面深化改革适应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形势，深刻回答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推进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提供了有力支撑。全面依法治国进一步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治理方式，深刻回答了将改革和发展引入法治轨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实现经济新常态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深刻回答了以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坚强保证。正是基于新常态这个大背景，着眼“发展起来以后”如何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四个全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筹改革发展法治党建之间的有机联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确立了新向导，是我们党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与时俱进的新方略，为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指引了努力方向。

四、“四个全面”彰显“正能量”这个大担当，为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增添了新动力

理论的魅力和威力源于真理对实践发展产生的正能量。有没有对不断变化的实践释放正能量的使命担当，不仅是衡量马克思主义自身价值的重要尺度，也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生命常青的重要标志。“四个全面”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根本的4个关键方面整合为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战略性顶层设计，必将在思想上产生系统聚合效应，在工作中形成链式裂变效应，催生出促进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正能量，从而成为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人民士气的精神旗帜。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乏力、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的突出问题，如何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啃下改革剩下的硬骨头，如何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如何用优化政治生态，既看方法智慧，又看精神境界，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极大创造热情，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因此，“四个全面”是集聚正能量的现实举措，为我们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迎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美好明天带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执笔：邓清柯）

本版编辑 欧阳优

五大变量影响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对话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宇燕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世界经济的走势和前景，势必会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前景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发展活力有所增强。这一成绩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取得的？下半年全球经济又将成色几何？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有哪些主要影响因素？未来需要警惕哪些风险？中国经济在这一背景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制度变迁、资源环境约束，五个变量关系密切、各具特点

步的源泉；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也是产业升级和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制度变迁一方面通过改进现行激励机制为技术进步提供有效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维持自身稳定性和适应性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并收获更多贸易收益；市场规模的拓展势必深化分工与专业化并进而鼓励技术与制度创新，其结果便是产业结构提升；而上述整个互为因果链的良好运转，受制于一国或全球的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技术进步。经验显示，重大科技发明出现后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通常要经过三四十年的。即使把3D、生物制药、智能机器人和大数据视为重大科技进步，根据历史经验，人类要普遍享受它们带来的果实还要等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全球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令人担忧，从1999年到2006年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6%，2014年仅增长2.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但全球TFP增长率过去几年的表现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当然，没有技术创新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从技术进步中受益。技术从高端国向低端国、从高端区向低端区扩散或溢出，一样能够导致经济增长。如果说重大技术发明的路径难以准确预知，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促进技术这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方面有所作为。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得自技术扩散的收益”空间仍旧是巨大的。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在扩大和优化研发投入、改良与创新相关体制机制等方面可以大显身手。

与经济长期增长直接相关的另一因素是劳动投入的增长与劳动力的质量。最近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了总人口的15%，而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超过10%就是老龄化；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25%；欧洲的情况比日本好不了多少。

二、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应重点关注的来自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

从而抵消欧日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美元汇率如果出现大幅振荡，还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本大规模异动。仅2015年第二季度就有1200亿美元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彭博社追踪的24种资产交易最为广泛的新兴市场货币，7月有20种对美元贬值。

如果说周期性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伴随物，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比较紧迫且重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新一轮金融危机以及衰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领域。要知道距离上一次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最令人不安的事实还是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2001年私人 and 公共部门的全球总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160%，金融危机时的2009年为200%，2013年更上升至215%。据麦肯锡估计，2008年至今，全球债务总额共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提高了17个百分点。我大致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2008年大衰退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没有让坏账得到全面清理，没有让金融系统得到整顿，也缺乏使政治应对成为可能的呼声。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否则债务人将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利率水平总体低落压低了借款成本，从而又加速了债务累积。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使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见肘。然而一旦出现全球杠杆危机或流动性危机，资

美国50岁以上人群占到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天有1万人加入领取退休金的队伍；俄罗斯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更不乐观，有人讲俄罗斯未来发展人口是大问题。人口老龄化或适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是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人口老龄化或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或绝对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加以抵消。这就涉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等问题。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从国际角度看，人口多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规模大小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能力两个方面。人口众多与市场规模巨大势必会增强一国的国际谈判能力。

决定经济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之提升，也和分工与专业化程度高度相关。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只要不同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只从事那些最能发挥其优势的生产性活动，并且通过市场交换，他们便可以获得所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从而实现无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决定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高低的基本且直接的因素就是市场规模大小。要想扩大市场规模，除了大力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创造国内统一市场之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最大化自身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被看作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以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成功实践。印度近些年来快速增长，亦与充分运用和大力拓展其国内外市场规模关系密切。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是经济增长的2到3倍。这既是全球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是结果。出现贸易高速增长原因原因在于，随着冷战结束世界第一次全面深入地进入了全球化进程。在未来几年，很难相信会再发生过去年十多年的那种全球化，因而分工和交换发展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空间不会很大。

伴随市场规模扩大而来的要素更合理配置最终能否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第二来源，还取决于制度基础设施

或“软”基础设施的质与量。制度基础设施涵盖的内容众多，其根本要素不外乎有效地保护财产权利、使契约得到普遍尊重、自愿交易免受权力过度侵害。制度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的：一是为每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创造出形成稳定预期的环境，二是为他们提供有效激励，三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基础设施的上述三大功能，构成了市场起配置资源之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应该讲，无论全球还是特定国家，制度改进的空间都是巨大的。

技术进步或扩散、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流动、市场规模和贸易投资的拓展，均受制于全球的制度。当一个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取“得自贸易的收益”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途径之一时，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国际规则的一个显著特性在于，它们大多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国际规则对不同国家意味着不同成本与收益。换言之，在必须深入参与全球分工的前提下，各国所获得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因国际规则的“歧视性”而有所不同。在各国大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事准则的世界里，制订对自己更加有利的“非中性国际制度”便成为博弈焦点。当今世界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谈判不畅或受阻，诸边谈判兴旺的局面，不仅会迟滞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更会分化进入不同经贸集团国家的增长绩效。

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作为约束条件出现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讨论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不仅耗费太多，而且开始品尝由此带来的恶果。在整个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4倍，碳和硫氧化物排放增长10倍，年捕鱼量增长36倍，工业产出增加40倍，而能源利用率只提高了16倍，以至于世界主流观点认为，如此这般的增长已经危及到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后代的经济发展，因而不可持续。人类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最主要的两大原因，一是自然资源的定价低于社会成本，二是投资回报不确定引发的储蓄率偏低。为了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需要明智且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支持更加有效的消费和投资选择。这些公共政策对我们已经熟悉的经济增长而言，多数恐怕是约束性的。

度将显著放缓，到2023至2033年将下降至3%略强。会这样吗？在当前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划出什么样的轨迹？

张宇燕：萨默斯那篇文章我认真读过，但有些影响中国长期增长的因素他要么未提及，要么低估了。

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内可望保持中高速增长，很多专家都作过严谨的研究论述。在此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是中国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三分之一个世纪时间里，与经济增长相伴的是因改革开放而得到释放和拓展的市场规模。原来无法进入市场交换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可以交换了，曾经无法买卖的住房可以买卖了，未来收益权市场即股市也健全起来了。我们知道，市场规模大意味着分工与专业化不断深化的空间或可能性大，意味着收益递增的可能性，而分工与专业化以及收益递增又是技术进步、进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条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市场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空间。现行的一些束缚市场发挥应有功能的规章制度，一方面可以被用来说明中国长期增长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支撑中国长期增长的基础之一，因为障碍的扫除带来的通常是能量和速度的更大释放。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还应包括对外进一步开放。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分工，发挥自身绝对和比较优势，同样构成了中国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一个源泉。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也应该放到这个层面来理解。文/本报记者 马志刚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产业来源”之一，据《经济学家》杂志分析，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资产管理产业”。2013年，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高达87万亿美元，占到银行业资产的四分之三，其中仅黑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就达4.4万亿美元。比资产管理规模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却不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而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为了满足保守的会计要求，它们的盈利模式已开始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放大器，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活跃于短期债券市场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受到较少监管的资产管理公司一旦出问题，如果应对不当的话其连锁反应势必迅速扩散。多年前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又一个不确定性。如果经济将成为一种处理国家关系的常用手段，则很可能会引起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

记者：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